

編者按:

又一個“4.23 世界讀書日”來到了。十五年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有識之士們所追求的“讓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每一個人都能讀到書”的目標,卻隨着電腦網絡的普及而似乎熹微有盼。然而,似如悖論,九年前,一部漢譯名為《讀書的挽歌:從紙質書到電子書》(*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呂世生、楊翠英、高紅嶺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版)卻橫空出世。其原著作者是美國當代著名批評家伯克茨先生,他表達了對“電子時代閱讀命運”的深層次的憂慮,認為傳統印刷術的挽歌已奏響……隨後在《中國編輯》雜誌2005年第6期上,有一篇名為《書比人長壽》的文章寫道:“剛剛讀完一本讓出版人有些沮喪的書……讲的是電子時代,由於新媒體泛濫,娛樂的誘惑多而炫,圖書閱讀被擠到了生活的支流末端,原本十分大眾的社會行為,如今縮窄為小众節目了,難免讓一些人傷感,也會讓一些人鎮定。”於是,我讓研究生找來了這本書瀏覽起來。

《讀書的挽歌》在“引言”《讀書之爭》之外,分為三篇,依次是《閱讀自我》、《電子時代》和《臨界狀態:三種思考》,所謂“三種思考”即有關“西方的鴻溝”、“文學的消亡”和“變窄的地帶”的思考,“尾聲”為《浮士德契約》。作者所憂慮的是: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在歷史眨眼的瞬間,我們的文化已開始呈現出一種全面改觀的態勢……印刷品的穩定結構體系——那個世界的一種規定的標準——正被近期出現的印刷電路脈沖取代。屏幕並沒有完全替代書籍(我們手里接着的這本書就是證明)——將來也不會——但每個觀察者都會明顯地看到,取代的規模逐漸增大。這種變化只是整個經濟形態更大規模變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將影響各個階層的人。但是,生活在無以計數的種種網絡海洋中,我們可以說印刷領域內的這種變化會逐漸擴張,一直達到整體的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力量的騷動。

這場變化非常巨大,但其中只有一部分才對文學產生直接作用。然而整個社會條件的總體變化注定要對讀書與寫書產生深刻的影響。先前那種穩定的體系——作家於軸線的一端,編輯、出版人、書商位於中間,讀者位於另一端——現正緩慢地彎成了一團。作家寫了什麼,他怎樣寫,怎樣被編輯、出版、銷售,被閱讀——所有這一切原有的觀念正在經受考驗。但這些還只是表面的現象,更深刻的變化則發生在主觀領域內。作為印刷的書籍,寫書和讀書的方式發生了變化;由於電子通信處於主導地位,文學活動的那種‘感覺’也發生了變化。讀書與寫書具有了不同的意味,產生了新的意義。當這個世界匆匆地走向其神秘的約會地點之時,原來認真閱讀嚴肅圖書的那種行為已經變成了挽歌式的舉動。當我們思索上述行為之時,我們必定產生對我們曾經認定的人文主義價值、精神與物質、主觀性本身等各方面問題的深刻質疑。”

假如說,當《讀書的挽歌:從紙質書到電子書》被剛剛漢譯後介紹到我國來時,它還是默默無聞的,那麼時至今日,再也沒有人認為伯克茨先生是在杞人憂天和無的放矢了。中國的媒體甚至發出了“網絡文學的壟斷局面已經形成”的驚呼。但可喜的是,中國各地在經過了漠然以對“世界讀書日”的多年之後,如今已積極地響應並努力開展着閱讀推廣活動,以應對國民對紙質書刊閱讀率的進行性下跌問題。

全民閱讀推廣工作,正是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背景中,日益成為一項必需要長期堅持的,其意義十分深遠的社會文化工程,而公共圖書館則在其中肩負着左右關注、上下求索的重任。這對圖書館人來說,是挑戰也是機遇,因此更需發揚有為才能有位的知识理性,用投入讀者工作的時間來換取閱讀推廣的空間。正如伯克茨先生在《讀書的挽歌》一書的尾聲《浮士德契

约》所陈述的那样：“我最担心的是，作为文化，作为人类，我们正变得浅薄……我担心我们在放弃智慧，为智慧而战，千百年来一直是‘文化’这一概念的核心；我担心，我们在立誓要信任网络。我们近来对智慧抱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观念？谁代表智慧？甚至谁在祈求智慧？”

本期刊发的有关岳麓书社新版《观澜文丛》等“馆配图书”的推介文章，以及苏州图书馆、江阴图书馆在读者工作领域的经验总结，就都包含着让学习型出版社、学习型图书馆与学习型读者、学习型社会共同成长的先进阅读文化理念。编者坚信，通过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广“全民阅读”，书香必将成为引领公众回首过去、珍惜现实、建设更美好未来的重要精神元素。

· 阅读论坛 ·

岳麓书社《观澜文丛》首发品评会谈荟

荣方超 唐 曦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江苏南京 210093)

1月9日下午，由《图书馆报》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阅读学研究会联合岳麓书社主办的《观澜文丛》首发品评会在北大图书馆举行。北京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高倬贤研究员、《图书馆报》赖雪梅总编辑先后致辞，岳麓书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易言者先生发表了书面讲话。

《观澜文丛》是一套以“文史观澜，悦读顾问”为宗旨的中国文史随笔和国学札记书系，在文风上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备，知识性与可读性俱佳。由南京大学徐雁教授等策划组稿，作者多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的知名学者。文丛收录有来新夏《交融集》、马嘶《学人书情随录》、袁逸《书色斑斓》、林怡《榕城治学记》、徐雁《江淮雁斋读书志》、姚伯岳《燕北书城困学集》、刘蔷《清华园里读旧书》七种文史读物。

徐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

我是1980年入学北大图书馆学系的，今年已走近三十周年。这次携与岳麓书社杨云辉先生最新主编的《观澜文丛》，借这“百年书城”的一方宝地到母校来汇报，特请各位师长和北京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朋友们来共同批评和教正。

在象征国学庄严与浩瀚的满底色的黑色中间，《观澜文丛》在装帧上以一纸白式签条标示了书名、作者与出版者，以一幅意境辽阔的国画和一枚“文史观澜”的红色印章为点缀，昭示了中国艺文的深邃底蕴。这套书的作者中年事最高的是《交融集》

的作者，1923年出生的当代文史学家来新夏教授。作为南开大学教授，他著述的史料笔记书籍十分丰富。本书内容涉及到了目录学、地方志学、史科学等传统学问的治学经验，以及目耕手披以后的种种治学心得。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宁宗一先生在《交融集》的序言中指出，解读来先生退休后所写一系列文史随笔文本，发现作者“在史学和文学两条路并行的轨迹上，进行了从容的对接”，他用随笔描绘人、事、书、物、山川的品格与气韵、性质与形式，在历史与现实的横断面上，“逼真地展示了人世百态和各有一方天空的学术文化，这既体现了他的学术见地，又说明了他文化焦虑和对现实关怀之深”，读其随笔，“好像总是能不断地听到一连串的声音：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活着的历史！”因此，“以当代意识审视历史，又在历史的背景上思考当代，真正做到了当代意识与历史深度的融合”，这是来新夏先生文史随笔的显著特点。

此外，还有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著名作家马嘶先生，以及袁逸等四位分别在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者——这似乎是一个象征，代表了中国文史学界老、中、青三代一种接力赛式的努力，寓示着中国人文香火的一脉相传。

高倬贤(北京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研究馆员)：

我代表北大图书馆朱强馆长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观澜文丛》首发品评会能放在我们图书馆，

我认为是令北大图书馆这座“百年书城”生辉的。

当我的面前摆着这七本大方庄重的著作时,我甚为感叹。因为这几年来,北大注重收藏国外著作,国内大概只收五分之一。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跟学科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是这种书籍的品类出版少,不得不让人忧虑。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经混淆不清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书问世,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为此感到由衷高兴,我代表北大图书馆对各位专家学者能在这里小聚表示衷心欢迎!

赖雪梅(《新华书目报》总编辑):

非常高兴我们能和北大图书馆、中国阅读学会来共同主办这个活动。《观澜文丛》的出版,是对读者阅读的一种重要指导,也是对构建“书香社会”这个总目标的贡献。我们《图书馆报》的办报宗旨是立足出版产业,建设阅读文化,这与《观澜文丛》的出版宗旨,是殊途同归的。

目前在我国一年出版新书二十六万种,但真正原创、真正有价值的图书有多少?这是我们作为出版者需要深切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国家在她的文化建设上,能够出真正高品质的图书才是出版产业发展的一个衡量标准,而不是以品种作为衡量标准。在每年的订货会上,都说订货码洋如何增长,这是实际的吗,我们后来的退货又有多少呢?现在的图书品种这么多,我们的库存码洋又是怎样的呢?出版界每年的库存码洋在出版社里应该是400亿左右,这样造成的纸张浪费和资源浪费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如果都能出版像《观澜文丛》这样对社会有价值的品种,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是极具意义的事情。

《图书馆报》于2003年创刊,但今年1月份才正式独立发行,这是我国国内第一份图书馆报,据了解也是世界上头一份图书馆报。就图书馆界、出版界、发行界的关系来说,和国外相比,关系也不够紧密,因此《图书馆报》的诞生是切合了图书馆界、出版界和发行界的需求。从我们报的角度,《观澜文丛》肯定是要力推给读者的。

在我们报社内部,我每年都要对我们编辑部员工推荐若干图书,如果我的员工都能够自觉来读《观澜文丛》这样的好书,自己的文化品味就会提高很多,再对社会进行专业服务的时候,职业品质也会提高很多,这样我们的办报宗旨也就有希望真正达到。

易言者(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级经济

师,书面发言):

湖南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司(原岳麓书社),是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历来以传承文化、繁荣学术为己任,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了地方古籍整理、古典名著普及和中学《历史》教材等图书品牌,综合实力在全国古籍类出版社位居第一。2009年,岳麓书社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之一。

自1982年创立以来,岳麓书社相继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船山全书》、《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魏源全集》等一大批既具全国性意义、又富地方特色的名人著作集,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自2006年开始,岳麓书社承担湖南大型文化工程《湖湘文库》一半以上的出版任务,已出版了《沅湘耆旧集》等图书100余册,即将推出《郭嵩焘全集》等一大批湖湘文化经典。岳麓书社在古籍整理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到社会的公认。2009年3月岳麓书社中标“国家清史工程出版项目”,成为“国家清史工程出版联合体”成员单位之一。岳麓书社对地方古籍的整理,不断推陈出新,如《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等系列图书,已发行10万余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岳麓书社勇于担当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先后出版了《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古典名著今译读本》、《国学基本丛书》、《传统蒙学丛书》等系列图书。这些图书以其底本好、书品高、装帧美、价格廉的岳麓版特色,得到学界嘉许,深受读者欢迎。尤其是“四大名著”近十个版本辐射全国市场,年平均发行20万册以上,单品种累计销售2200万册以上。据开卷调查报告,岳麓书社古典文学类图书连续五年市场份额占有率全国第一。同时,岳麓书社的学术出版,也彰显了出版湘军劲旅的特色,先后推出了《凤凰丛书》、《长河随笔丛书》、《海外名家名作丛书》等一大批厚重的学术研究专著。2009年,岳麓书社又重点打造“民国学术名著丛书”,该套丛书第一批收录图书73种,由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选目,所选书目皆为民国时期文化泰斗的经典学术著作,第一、二辑共40种此次北京订货会已隆重推出,必将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道丰富的文化饕餮盛宴。

经过数位岳麓人的努力,二十多年来,岳麓书社累计出书2800余种,其中200余种先后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优秀古籍图书奖”等高级别奖励。近年来,《魏源全集》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里耶发掘报告》获得第二届中华优

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等。岳麓书社的发展、壮大和辉煌,离不开学术界各位朋友的鼎力支持,勤劳奋进、敢为人先的岳麓人,将以更加开放的思想,更为宽广的胸怀从容面对市场的挑战,热情迎接四方宾朋的合作参与。

徐雁:

非常感谢岳麓书社编辑部的杨云辉代表他们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易言者先生宣读的书面致辞。岳麓书社是中国古籍社系列中一个拥有优良声誉和资深品牌的出版社,位居古籍出版发行界前三强之列。书社对《观澜文丛》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我们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也对推动岳麓书社这套文丛有着良好意愿,希望这套文丛能够成为“馆配图书”和“全民阅读”活动中的新书和佳品。

这次我们还特意请来了本文丛的编委,也是我国著名书法家、西泠印社理事、福建十大藏书家之一,原福州市文联副主席林公武先生,他给我们以上三个主办单位赠送了墨宝。他代表我们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给北京大学赠送的墨宝,是在北京大学做过五年老馆长的李大钊先生的话:“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赠送给《图书馆报》的是中国现代著名藏书家顾颉刚先生的名言“愿我们的图书馆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图书馆”。第三、四幅是烘托岳麓书社《观澜文丛》的“清芬作文,沧桑话史;先生扬波,后生观澜”和“刚日阅经,柔日读史;晴时观子,雨中赏集。”

在岳麓书社最初策划这套书的时候,他们对我们北京大学的白化文先生特别的尊崇,想让白先生的一部随笔书成为排头之书。很遗憾,白先生的书被“近水楼台”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捷手抢走了,所以这套丛书才成为了七本,而不是初期策划理想中的八本。在我分为“文献史读解”、“古欢与陈香”和“旧书文化随札”三辑的《江淮雁斋读书志》后记文字中,我有一千多字谈了我 80 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聆听白先生教课,以及自己读了白先生文史著作后的点滴体会。下面有请白化文先生发表对这套丛书的批评!

白化文(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徐雁说动岳麓书社,要组稿出版一套《观澜文丛》,扶助学术,我当然举双手赞成。但实际上今天在这儿最没有资格说话的就是我了,因为他也“派”

我为《文丛》写一本,这不挺好的事吗?我就赶紧打印,照片也准备好了,搁在那高高的一摞。正当我在那高兴的时候,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高女士到了,她是谢冕的博士。她来我家,看到桌上搁的稿子,我告诉她是怎么一回事,说连合同都签好了,她翻翻稿子就说不能给他们,没十分钟就拿个兜装走了。这不《观澜文丛》也就成了现在的七本了……

中华书局有人跟我说,现在古籍出版有四个“大社”,我问是哪四个?中华书局还真谦虚,他说他们是“老四”。我说你怎么会是“老四”呢,那另三个呢?他说岳麓书社规规矩矩出书,而且出的书质量和数量很平均,虽然不以赚钱为主,但赚到了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是非常聪明的出版社,品种多、赚不多,但赚点钱就收,也绝对能赚到钱。

我就问他,为什么赚点钱就收?他说这很简单,他有一后盾就是国家图书馆,他只要经济上有点小危机,就从国家馆拿点古旧书来影印,影印书是按成本计算的,假如成本是 5000 万,他就薄利多销,到 6000 万为止,赚点钱就完事了。而且每种书他又印不多,印那么三二百本,然后把版存起来以后再说。把这三二百本卖出去后,又弄出来另一本书接着再来……咱们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守着不少书啊,干嘛不这么干呢,咱们也来跟岳麓书社“合作合营”多好啊。我因为出书的事对不起岳麓书社,因此就给出这么个主意,建议北大图书馆和岳麓书社快快合作。

徐雁:

当年我跟我的同窗姚伯岳听白先生课时,只能听懂一些知识和学识的皮毛。现在,我们越听白先生的话越有底蕴,越有境界。

马嘶先生在本文丛之一的《学人书情随录》自序里说,他的“这些围绕着书人书事随意而谈的闲文短章,是我承受传统文化哺育和国学熏陶的人生轨迹中一些零星的记忆与情思。这种芜杂又欠完备的述说,表现的不过是对长期濡染了我的心态、铸造了我的灵魂的某些书和人的深切眷恋之情。或者说,这是我对心向往之的‘书香’(或可拓展为‘书香社会’)点滴的浅薄思索和粗笨解读,充其量不过是说出了自己的一点经历和心得而已。”

《学人书情随录》中的文章,主要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恰好是他刚刚退休的前几年,本书标志着一个文人和作家老有所为的成就之一。接下来请马嘶先生代表我们作者先作发言!

马嘶(著名作家,《学人书情随录》作者):

我的书能够跻身于这套《观澜文丛》中,既感到高兴又感觉有些汗颜。当然,高兴是主要的。汗颜是因为,同另外几本厚重的专业性很强的书相比,我的这本《学人书情随录》显得真是太庞杂太浅薄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回到了我的母校来参加这个会,会又是在北大图书馆开。

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我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消磨在图书馆里的。我是1953年入学的,那是大规模院系调整的第二年。文科的学生主要是在文史楼阅览室里做课外学习的,那里有大量开架的工具书和指定参考书。我不满足于只在这里读书,便常常到前面那个我们叫做“大图书馆”的地方去借书读书。那是原燕京大学图书馆,当时那里的藏书主要是燕大的,红楼那边的书基本上还没有过来,书上盖的图章多是“燕京大学图书馆”或“哈佛燕京学社”。那时候的图书馆跟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那时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好的图书馆里读了这么多的书,实在是太幸运了。

今天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书香社会”渐行渐远。中国是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书香传统,尽管历代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目不识丁的,但他们对文化、对书香也有着敬慕、仰慕、渴慕之情。比如,“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读书人讲的,但老百姓也这么讲。或者说“学而优则仕”,有很长一个时期,老是批判它,但老百姓也是承认它的。科举制度不是比世袭、买官捐官、或由个人指定接班人等更进步吗?今天公务员不也是公开招考、竞争上岗吗?

我觉得,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着营造和反营造书香社会的拉锯战,或者叫做一场拉回和反拉回书香社会的交锋。一方面是如徐雁先生他们这样一批有志有识之士,殚精竭虑地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重新营造“书香社会”,如设读书节、办读书月、建农家书屋等等。另一方面是低俗文化越来越严重地侵蚀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一些主流媒体、强势媒体一面在宣传书香,一面又连篇累牍、大张旗鼓地让低俗演艺频频亮相。尽管这拉锯战是无组织的,无序的,但要拉回那延续了数千年的缕缕书香,使之再度成为众望所归的行为信条和行动准则,已经并非易事,而是需要几代学人的毕生努力了。

我想,《观澜文丛》策划者、编辑出版者们,如果能够把渐行渐远的“书香社会”向我们拉近一些,哪怕只有一厘米的路程,也就不负你们的一片苦心了。

徐雁:

刚才马嘶先生代表我们《观澜文丛》的作者,也代表我们老一辈的学长表达了对社会高雅文化、阅读文化的忧思。他是1953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这对于他至关重要,因为定位了他一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遭受“文革”,直到退休后,他才全天候地为实现青年时代的梦想而努力。这个集子中的文字,是在这个时间里写出的。而他用以治学、著述和收藏的大量图书文献,也多是在这些年中积聚起来的。

我本人作为60年代的人,也常常思考马嘶先生所思考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要面对那些70、80后的研究生,90后的本科生。正如马嘶先生刚开始讲的,过去接受文化教育的人比较少,所以社会的文化层次比较低。现在如果我们不力倡“书香社会”,不积极努力地推动“全民阅读”的话,也必然会让80后、90后乃至2000后更多地沦为这样一种较低的文化审美层面。如果那样,社会的悲剧不仅要重演,而且要轮回。所以马嘶先生的发言说出了我们作者们为什么要坐冷板凳读书写书这一种最重要的人文关怀。

倪晓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首都图书馆馆长,教授):

今天参加这会,看到这套书和有关的作者,非常感慨。我感慨什么呢?因为这七本书的作者中,五个人我都认识,都有二三十年的交情,感到很自豪。伯岳兄当年是学海社的编委之一,刘蔷是我的一个小师妹,交往也有二十多年了。来新夏先生1979年在历史文献学会里担任职务,张舜徽先生是历史文献学会的会长,当时来先生不知道南开大学图书馆系怎么办,他就到武大请教办图书馆系去了,我就和彭先生到东湖宾馆见了,从那以后认识的,我的硕士学位答辩论文还是他写的评语。袁逸和我学的都是图书馆学。不论是老师也好,朋友也好,出这些书我都为他们感到自豪。

在目前这个社会浮躁、学术浮躁、人心浮躁的情况下,岳麓书社发现了这么一批作者对书对学问有着孜孜追求,肯于推出《观澜文丛》,并热情地为他们编辑出版,说明出版社品味很高,非常值得敬佩。

我有一个动议和想法,中国阅读学会与东莞图书馆合办了一份《悦读时代》杂志,能不能在北方,也把首都图书馆作为中国阅读学会的一个

平台,我们首都图书馆掏点钱来创办也行。因为这是为国为民在做好事呀,一可以抬高图书馆读者的人气,二可以让公众都能知道如何读书,读好书。我们还可以设坛,请你们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专家来演讲,至少把中国首都的全民读书风气先营造出来。

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教授):

《观澜文丛》装帧设计得非常好,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作者们都是非常有名的专家学者。这些人首先都是爱书人,还研究书。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的时候,梁启超在成立大会上有个演讲,强调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要抓住两个特点,一个是书,一个是读者。他说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图书馆的建设就是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不能照搬欧美。这是针对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威普及公共图书馆,便于大众阅读的思想来说的。那篇演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图书馆工作者一定要懂得书。1928年胡适到上海东方图书馆作演讲时也有一个重要观点说,图书馆员、图书馆工作者,特别是馆长,一定要懂得书。

《观澜文丛》这套书给我的最大振奋就是作者中有这么多图书馆学出身的作者,有这么多爱书管书的人,他们对书深有了解,对古籍善本的研究已经不是一般水平了。这套书推出后,对我们整个专业领域都会有影响,对书香社会的建设也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陈品高(《博览群书》杂志主编):

这套丛书的主编徐雁先生也是我们《博览群书》杂志的编委。《观澜文丛》的出版之所以值得祝贺,是因为现在每年出版二十多万种书,包括新书和重版、再版的,但究竟“好书”有多少呢,很值得质疑。而这套《观澜文丛》则是“好书”之一。

《观澜文丛》是文史随笔丛书。怎么来普及优秀文化,让读者爱读?在写作上就要做到晓白通畅,深入浅出,这样才有读者来看。文丛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索,丛书中的好几位作者是从事文献学的。我们《博览群书》杂志是1985年创刊的,主要以推介人文社科类的新书、好书为宗旨,所以在这里,我也向在座的各位作者、专家约稿,欢迎大家给我们撰稿,回头也和徐主编商量一下,尽快做一个专题,来向读者宣传好这套丛书。

郭英剑(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院长):

今天到这个会场来,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书”。刚才《学人书情随录》作者马嘶先生提到了“书香社会”的问题,我想,“书香社会”就整体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香”的,不是所有的书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都是正面的,都适合于这样一个时代,适合于我们的下一代阅读的。但“书香社会”倡导大家去读书,必定会对未来产生好的作用。

《观澜文丛》这一类文史随笔我从来都是很喜欢读的。对于这一套书或者说这一类人文书籍的重要性,我总结了三个方面:

第一,《观澜文丛》的问世,事关“人文教育”。文史并治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向来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教育过去主要以文史为主,但科技不足。二十世纪以后有所发展,但在二十世纪之前,主要还是以文史为主。如今呢又有一个不好的大趋势,就是把中国文史这方面的传统“边缘化”了。这就需要我们的学者、出版者来“纠偏”。

第二,《观澜文丛》这一类书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学术史细节”的揭示上。写学术史时候的很多细节,给我们提供了学术史内在的逻辑性。比如马嘶先生《学人书情随录》中写到的金克木先生,如何从一个北大图书馆馆员成长为大学教授的小故事,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真实的细节。相信“观澜文丛”这一套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当然其中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反映出学问、学术、学人的内在逻辑性,能够给我们的认识提供很多具体的帮助。

第三,《观澜文丛》这一类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传承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作者们的写法基本上追求的是一种大众化写法,这种写法实际上继承和发扬的是一种大众文化的传承方式,事关中国传统文化大众式的一种接受。像这类的书籍,希望岳麓书社如果能出的越多越好。

喻静(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昨天下午我拿到《观澜文丛》后,我就去了中国人民大学“水穿石”咖啡馆。在馆里很喧闹的环境里,我迅速的翻阅。我是在1988年入学北大中文系的,但在六个月前,我还是一个出版人,我能够从这套书的各种细节设计中,读出主编、作者和编辑出版者的良苦用心。因此在刚拿到这套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赞美。假如不是从主编这里获

赠,而只是在书店里看到,我也一定会把这套书请回家去的。

从马嘶老师的新著《学人书情随录》中,可以体会到一种源自北大的人文精神。那就是像许多师长那样,即便仅是一介书生,也要用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笔去担负使命,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影响今天的人,影响后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马老师的为人和为文以及他给我们讲述的前辈的故事,给了我前行的智慧和勇气。这种精神,我在徐雁、姚伯岳等学长身上,都能看到。我读了他们的书,心里很感动。我觉得校友们见面彼此都会经常性的寒暄,也许很少会把北大精神挂在嘴边,但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没有忘怀,都在默默践行,像马嘶老师都已七十多岁了,还在为我们奉献《学人书情随录》这样的好书,还在孜孜不倦地唠叨着和北大以及北大中文系有关的种种掌故,这种心意,这种教诲,我们唯有恭敬领受并身体力行。

最后,我想赞美一下这套丛书的名字《观澜文丛》,这让我想起孔夫子站在川流不息的水道上感叹的“逝者如斯夫”。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实有悟于心 and 洞见之明的……匆匆翻阅了这套书,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编者取书名为“观澜”的苦心?

韦力(著名古籍版本收藏家):

《观澜文丛》这套书中有五位作者我都很熟悉。跟马嘶先生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在二十年前,就拜读过他的文章,那时马嘶先生的文章在《旧书信息交流报》上连载,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见到了作者,感到很荣幸。

《观澜文丛》这一类文体介于书话和随笔之间的丛书,我读的最多的基本都是徐雁先生策划创意搞出来的。二十多年下来能够坚持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传播书香,搞文化建设,他用力打通了读书与藏书之间的界限。

我个人喜欢藏书,但认为做这件事很难,因为现在的社会都是很实用的。当前印成印刷品叫“书”的东西有很多,但真正能称之为“书”的东西,个人愚见其实并不太多。可是又没有办法,社会的大环境就是这样的功利和实惠。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实用的个性,因此中国传统的文史教育,那些经学系统基本行使着准宗教的思想文化作用。但“五四”之后,在反封建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对当前的影响至深。

近二十年,私家藏书也是这样,文脉的断档,使

得大家对藏书实际上是站在一种玩的、猎奇的角度来讲,藏书和读书的这种隔列,到现在也没有太大的改观。当然,能与书亲近,毕竟也是社会的进步。总之,《观澜文丛》这种书能够问世,对社会是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的。

王波(“书间道”博主、《大学图书馆学报》执行主编,书面发言):

姚伯岳老师给我送来《观澜文丛》,抽空拜读了全部7本书的前序后跋,发现这套书的基本旋律是“古文献阅读和古籍整理”,但具体各书内容也不尽然,反正都与书文化相关。全套书装帧雅致,封面为灰黑镶白,平均篇幅20万字出头,350页左右,均价25元。

文丛的一大优点是作者的年龄拉得极开,真正是老、中、青相结合,长者如新夏先生,属于20后,马嘶先生,属于30后,而中青年学者袁逸、徐雁、姚伯岳、林怡、刘蔷等,则皆为50后、60后,甚至接近70后,老少和鸣,可谓其乐融融。

另一个优点是亦庄亦谐。甬以为这套书古雅学究,乃“全真七子”讲旧书,不太好读,其实当中不少文章既有真材实料,又幽默诙谐。在这“七人帮”里,来先生古稀变法,某些文章颇有谐趣。马嘶先生是位老作家,写的多是老辈学者的读书生活,有张中行之风,可读性也很强。徐雁教授开博客、善演讲,文风上更尝试口语化,一些文章多用语气词。

最合心意的是,我盼望已久的袁逸老师在深圳图书馆馆刊《公共图书馆》杂志上发的系列读书随笔终于结集,加入这套文丛的联播,而且还起了个很诱人的名字,叫作《书色斑斓》。他的“后记”写得极妙。建议读完该书正文,再读“后记”,那样绝对会让你达到读书体验的高潮。

这套书中最年轻的作者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刘蔷博士……她的文章结集题为《清华园里读旧书》,学问扎实,文笔清新。她的经历表明,一个人的成功,固然和自身的刻苦努力和不懈追求有关,但和所在的岗位和碰到的机遇也关系极大,在什么岗位,下什么功夫,做什么学问,就有什么机遇。因此很羡慕身在图书馆古籍部的同行,可以去做扎实高深的学问。

王媛(《今日阅读》杂志编辑、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秘书长):

参加这样一个群贤毕至的品书会,我非常荣幸。我在1997年才进入北大信息管理系学习的,2004

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即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服务至今。刚才多位老师提到了对“书香社会”渐行渐远的忧虑。的确,现在我们拥有太多的阅读选择。但以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而言,我非常赞同姚伯岳老师所讲的“读书可以凝神”。每天大量的时间坐在屏幕面前时,我东看看西看看,一天下来心里担心的不得了,“哎,这一天又什么都没看。”不过,当我睡前拿起一本书读时,却很容易使心态平和,会很满足得进入睡眠状态。从我自己的例子可以看出,读书已绝不仅仅关乎文化传承,甚至也关乎身心健康。

有关倡导“全民阅读”,我的导师王余光教授是早期实践者之一。他早年编写了大量有关读书的著作,并在2005年提出建议在中国图书馆学会中设立一个专门用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开展专门工作委员会,这就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2009年,该委员会改组为阅读推广委员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目前下设15个专业委员会。徐雁老师目前担任着阅读推广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在座的多位老师都是其中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目前,我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和其会刊《今日阅读》(苏州图书馆主办)的编辑,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图书馆界及相关业界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向大众推荐适读图书。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观澜文丛》就完全符合被推荐的标准:出自岳麓书社这一名门,出自诸位名家之笔,虽是实打实的学问,却又绝不板起脸来说教,可读性和史料性俱佳。身为后学,我一定会认真读读这套《观澜文丛》!

徐雁:

谢谢王媛副秘书长对这套书所发表的期待之语和她内心的感言。按照今天的发言程序,基本上要结束了,我们刚才征求了媒体朋友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愿意与《图书馆报》一起,大力支持这套丛书在岳麓书社的出版以及在传媒界和读者中的宣传传播。

接下来,请允许我郑重推荐我们的另一位读者代表、福建省委党校文史部教授林怡博士。她对孔夫子、朱熹的学说、对八闽文化的研究都有很出色的见解。林博士是杭州大学文献学学士、硕士,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博士,2001年破格评聘为教授。先后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日本国立冈山大学、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文史部。从国学的角度来讲,她代表了一种很好的学识结构。目前已经出版论著

《庾信研究》、《渐不惑文存》等。

林怡(福建省委党校教授、《榕城治学记》作者):

今天外面天寒地冻,但在这个会场里,却让我们这些作者感到非常温馨和受益。在当前社会浮躁、学风浮躁的环境里,岳麓书社能够组稿并编辑出版《观澜文丛》这样一套书,作为作者之一,我觉得非常幸运,岳麓书社为这个社会中有品位的文化的传播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认识徐雁先生才三四年时间,是因为我的老师林公武先生介绍才与他相识的。他非常热情地参加了两届的“福州读书月”活动。当时岳麓书社希望《观澜文丛》各书在写法上能够深入浅出,让传统文化能够有更多的社会读者认同。在本书的写作整理过程中,我也努力这样去做了。

冰心在评价梁实秋先生时说过,一个人,不管男人、女人,都应该像一朵花,要色、香、味俱全。一本书或者是一个人,也应该是才、情、趣皆备才是。《文心雕龙·宗经》中也有一句话,说“往者虽旧,余味日新”,我想这也是《观澜文丛》这套书想追求的一种境界。

徐雁:

林怡教授的《榕城治学记》,由“中国智慧”、“名士风流”、“薪尽火传”三个专辑组成。在我当初与云辉兄一起策划这套书时,其中确实伏笔着一点人文的“玄机”,比如我本人请白化文先生给我写序,就是想请我的老师白先生来批评一下我的书稿。而林公武先生给林怡教授的书写序,这是老师给自己的女弟子写序。他在序中推介说:“林怡是我任教中学时的学生。其时,她已显露才华,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独具个性,文理不偏,学业优异。她去投考文科,我曾为之惋惜。但内心又颇欣慰”,“她在杭州大学,多从名师,如郭在贻、蒋礼鸿、雪克等,都是我所仰佩的学者。而她的博士生导师张可礼教授和陈庆元教授,是学深识博、治学严谨、为人谦逊的学者。他们都无愧于合经师、人师于一身的名师。林怡十分幸运,师承统系,咸沐雅化,斯文有传……”,她的《榕城治学记》内容所涉广泛,所论绵密,“于解经、论史、议人、记事皆能穷其原,究其委,驳难辨正,坦吐真言,直抒己见,故特见清新洁净,风调雨顺,琅琅可诵”,可谓的评。

在这套书中,还有另外一对“师生档”,那位老师是现在北大图书馆做研究员的姚伯岳先生,学生

就是他教本科时的女弟子刘蔷。本文丛中的《清华园里读旧书》这部集子,是刘蔷女史从已经发表的50多篇文章中选编出来的,也是她第一部学术论文和随笔集。

她素心于故纸披阅,曾到台湾、日本、美国、欧洲等地游学,访求中国古书。本书内容涉及苏州过云楼、天放楼,杭州妙赏楼、丰华堂,以及明代晋藩刻书、清乾隆时“翰林院印”与四库进呈本、“四库七阁”、清宫武英殿刻书、荣禄堂与清代缙绅书等历代藏书刻书掌故,还有清华图书馆中元刊本《唐翰林李太白诗集》、戴震《续方言》手稿、俞樾批校本《水经注疏》、金天羽批校本《史记集解》等琳琅满目的珍本秘籍。当代古文献学家、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序言中好评说,书中的文章“是她从事学术工作的少数副产品,从中可以体会到她在各项工作中的精细用心,是她自己的学术发现和学术贡献。”

刘蔷:(清华大学图书馆,博士,《清华园里读旧书》作者)

我套用一句今天开幕时徐雁老师说的话“他是北大永远的学生”,我认为自己也是北大永远的学生,因为我是1986年从天津来到北大读书的,是图书馆学系的学生。

今天在座的,首先有我大学时代的白老师,在他教的课上我是“课代表”……我还记得1986年秋刚来上大学时,就在这个图书馆的409室,是当时还在国家教育部机关工作的徐雁老师代表系友,作为我们的学长、作为北大学海社的创办人,来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弟学妹们讲解图书馆学系的传统和学海社的。姚伯岳老师更是我本科毕业时所做学位论文的导师,虽说我们现在是图书馆古籍领域的同行,但他确是我永远的老师。

可能因为我从大学读书到现在工作,始终没有离开图书这种环境,而且凭着自己的一点兴趣在做,因此我并没有读书的人少了、可读的书少了这样的感觉,我的感觉好像是书永远读不完似的。因此感到,能够在图书馆里工作,其实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有无穷无尽的好书供自己去阅读,但我又是一个懒而贪玩的女生,大学毕业二十年后才给我的母校我的老师我的学长交上这样一本“作业”,惭愧的很。今天我只是想对师长们说,希望我将来能够为中国图书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多尽一些自己的心力。

徐雁:

多谢刘蔷女史的真切发言,她的感受和决心,代表了我们这套丛书最年轻一位作者的学术和人文追求。我们希望年轻的刘蔷女史在《清华园里读旧书》之后,能够再接再厉,奉献出更多更新的中国文史和文献学随笔作品来。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北大图书馆古籍部姚伯岳研究员,他与我同在1963年4月出生,1980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是我的大学本科同窗,而且曾经同屋,堪称“同学好友又同道”。但他1984年毕业时,入了郑如斯教授门下成为硕士研究生,然后留系任教,主讲《版本学》、《图书馆古籍编目》等课程。1999年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从事古籍编目工作十余年,现任古籍部副主任。他的著作有《中国图书版本学》、《黄丕烈评传》等。

姚研究员曾经作为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访问学者,整理完成该馆所藏全部拓片。可谓身入娉嬛福地,坐拥百年书城。《燕北书城困学集》是从他发表过的50多篇学术论文中选出的,内容涉及古籍出版、收藏、版本、整理、分类、编目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麟台故事》、《中国藏书通史》、《中国版本文化丛书》等的学术评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教授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十年前,他转至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整日浸润于芸香之中。就我所知,从事版本学者,或长于实践,或长于理论,二者兼长者少。伯岳先钻研于理论,后运用于实践,以理论拓展实践,以实践丰润理论,取精用弘,卓然一家。”

今天还有一位作者,即本文丛中《书色斑斓》的作者、浙江图书馆学会秘书长袁逸研究员因公没有到会,他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早年毕业生。幸好来新夏先生给他写的序,评论推介都很到位。《书色斑斓》的作者多年从事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本书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版权制度,剽窃史实,书价与稿酬,买书、抄书、借书与书籍交换,书业广告和商标溯源;天一阁、嘉业堂诸藏书楼、藏书家的兴衰波澜,以及读书人的科举,读书人的婚恋,文化名人的病历,读书与烟、酒、药的关系,历代读书之幸福指数评估等读书人之众生百相。

来先生在序言中指出,《书色斑斓》集子中的20余篇文章,篇名都很有吸引力。全稿以书为中心,分为三辑:一是“书林捭阖”,对书史各有关问题做纵横谈,如于版权、稿酬、书价、剽窃、文稿征集等事,均有论述;二是“书楼探幽”,说与藏书有关诸事,如天一、嘉业的兴衰,抄书、换书、买书的(下转第115页)

先到舍下,拉上我,到时居朗润园的周先生府上,当时钱货两清。此书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正文32册,索引1册,共33册。后来,周府利用此书中的照片,由周一良先生的公子,擅长摄影和录像的周启锐先生翻拍,印入周一良先生的新著《钻石婚杂忆》等书中,也算多少物尽其用了。

周一良先生逝世后,遗留的大批书籍并无图书馆登记所说的“财产帐”,后人极难处理。周启锐同志问及在下。我建议:将其分成几大块:一大块是日文书,其中不乏现当代日本学者签名赠阅本,颇为珍贵。另一大块是周一良先生批阅本,如“二十四史”等,已捐赠给北大历史系。再有的就是其余的线装、洋装书啦,其中善本、准善本大批的,但需大型图书馆或中国书店的采购人员多日在周府工作拣选。于是,按我的意见行事。由我敲边鼓,先找北大历史系特别是古代史中心的人物,如个人关系和业务都接近周先生的荣新江同志,他们来看过,北大图书馆善本部的主任沈乃文同志等位都来看过,均因缺乏大量购书资金而兴叹。我甚至怀疑他们有吃窝边草思想,等着捐赠呢!一计不成,再找国家图书馆,他们也派善本部专管采购的程有庆同志等位来看过,也因类似的原因而止步不前。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总认为北京各大馆吃捐赠吃惯了,眼光也忒高。

于是,只可找专干采购的中国书店。我与他们是老朋友啦。虽然我缺钱,不怎么买书,可是他们不嫌弃我,老是帮助我,有求必应。例如,坐镇总店的

(上接113页)聚书经历;三是“书生意气”,述与读书人有关诸事,如苦乐、仕途、婚姻、烟酒等行为。来先生认为全书具有“汇通”精神、充足的古今信息量、见解独到,以及文才疏放见性情、文采风流有情趣的特点,作文取材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加以书中插图有数十幅他历年收藏的古人读书图片,使本书的可读性很强,堪称图与文并茂。

拙著《江淮雁斋读书志》,是我近年来继《藏书与读书》、《秋禾话书》、《秋禾行旅记》之后问世的一部最新文集,也是我自1988年以来出版的第20部书。本书的内容涉及北京厂甸旧书集市风情、绝代坊贾陈济川与坊间学人孙殿起、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中日汉籍交流之杨惺吾和岛田翰情结、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伉俪人生、巴金和黄裳的旧书情缘、中国地方志的蒐集流通与中国旧书业、湖湘近现代文献家、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收藏,以及《全祖望评传》、《魏建功传》、《夜趣斋读书录》、《国学四十讲》、《旧

许惠田经理,海淀店的李小琦女史,仓库的袁媛女史,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啦!中关村店里的薛胜祥、王宪东二君也是与我常年来往的。于是,我就打电话,向他们求援。总店决定,有拍卖价值的,交直属的海王村拍卖公司彭震尧、刘建章两位经理办理,其它的交中关村店。先由薛胜祥经理和王宪东同志帮助整理出个头绪,会计李硕女士估价付款。

他们到周府一看,认为起码得代为清理一个月,才有头绪。于是开干。中国书店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几位天天8小时,上下午两班,在周府整理。只喝周府白开水,中午回中关村店午饭。他们建议,分期分批,整理出一批,处理一批。不值钱的由他们先收购一些,其它的放在中关村店,或零售,或批售。他们还在店中设专柜陈列。听说至今也没有卖完。我总觉得,如各省市图书馆、大学文科系所,掏出一批钱来统购,绝对大占便宜。特别是那些日文签名本,极有收藏价值与使用价值。还有一批,由海王村拍卖公司拉走,分期分批拍卖。听说至今也没有拍完。

《北洋画报》也陈列在中关村店玻璃柜中多时。听说,此书2008年已经易手,价七千元,经中国书店中关村店售出。当然,卖主所得不到此数。我与此书的关系,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胜今昔之感。

【作者简介】 白化文,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时书坊》等的书话随笔。

去年中国书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6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的总序中有这样一段话:“阅读,只有靠一代接着一代孜孜不倦地接力,人类的文明才能得以延续,知识才能得以传播,社会才能得以进步。”因此非常感谢大家所发表的真知灼见,感谢本书策划与责任编辑、岳麓书社编辑部杨云辉先生(电子联系邮箱:yunhui@163.com)的组稿,并衷心期待岳麓书社为“全民阅读”活动中的图书馆配送书源增添包括《观澜文丛》在内的更多开卷有益的新品佳作。

参 考 文 献

- [1] 徐雁等主编.《观澜文丛》七种.岳麓书社,2010.1
- [2] 岛石主编.6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

10

【作者简介】 荣方超,男;唐曦,女,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